

台湾泛蓝阵营的政党合作分析

张文生*

[摘要] 2001年底台湾“立委”、县市长选举之后,岛内政治势力发展成泛蓝与泛绿两大阵营,泛蓝阵营的国民党和亲民党系出同源,具有意识形态、社会基础、政治利益和历史经验的共同性,形成了共同的政治亚文化,同时,从政党力量对比分析,目前泛蓝阵营力量超过泛绿阵营,岛内政党政治的现实为在野党特别是国、亲两党的合作创造了客观的政治环境,泛蓝阵营就政策法规、沟通机制、选举、权力分配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合作尝试,但是政党合作的成败取决于泛蓝阵营的团结程度。

[关键词] 泛蓝阵营 政治实力 政党合作

2001年底台湾“立委”、县市长选举之后,岛内政治势力发展成泛蓝与泛绿两大阵营,泛蓝阵营包括了国民党、亲民党和新党,泛绿阵营由民进党和台联所组成。两大阵营的对抗交织着统独意识与省籍矛盾,代表本土势力的泛绿阵营主导了台湾当局的内外政策,但是泛蓝阵营的制衡力量也受到岛内外各界的瞩目。正因为岛内形成了两大阵营对峙的政党政治结构,泛蓝阵营特别是国、亲两党之间进行政党合作的行为愈加明显,并成为影响岛内政局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泛蓝阵营的形成

在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中,选举被划分为维持性选举和重组选举两种情况,一般情况下,人们会在较长时期内保持自己的政党认同,有时还会保持一生。但是在竞争激烈、难分高下的选举中,会导致许多选民放弃原有的政党忠诚,建立新的政党认同^①。2000年3月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就是一次重组选举,国民党因连战、宋楚瑜两组候选人的分裂,使得民进党的陈水扁得以相对多数当选“总统”。原国民党的支持群被一分为二,选后岛内的政党结构发生重组,宋楚瑜凝聚竞选过程中的支持力量成立新政党——亲民党。

在台湾政治发展的进程中,政党的形成与政治亚文化的冲突相关。由于不同族群和省籍的民众之间语言、经历、习惯的差异,台湾形成了不同的政治亚文化。在政治亚文化冲突的地区,共识的程度受到亚文化分裂程度和对待亚文化差异的方法的影响。台湾岛内的亚文化分裂和歧视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加剧了潜在冲突的可能性。但是国民党内连战、宋楚瑜两组候选人的分裂并非政治亚文化冲突的结果,而是权力斗争的产物,从根本上说,国民党与亲民党同属一个政治亚文化的范畴。

共同的政治亚文化给国、亲两党的政党合作创造了可能性,而代表另一种亚文化的执政党民进党的强势作风则使得国、亲之间政党合作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民进党虽然夺得“总统”职位,但是在“立法院”,民进党仍然只是一个少数政党。陈水扁就职后,不愿释放“组阁权”,以

*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

个别“入阁”的形式网罗各党派成员,组织“全民内阁”,拒绝与在野各政党协商“组阁”,促成了朝野之间的对立局面。2000年下半年,民进党与国民党之间因“核四案”再次严重对立,唐飞被迫辞职,10月27日,继任“行政院长”张俊雄利用陈水扁与连战会面的机会宣布停建“核四”。扁政府的独断专行激起在野党的强烈反弹,促成了在野党的结合,11月11日,国民党、亲民党、新党三党正式组成“泛蓝阵营”,相对于执政的民进党,三党组成的“泛蓝阵营”也被大众传播媒体称作“在野联盟”或“泛蓝军”。

国、亲、新三党组成“泛蓝阵营”后,三党在“立法院”就“罢免案”、预算案、法律案、“正副院长”选举案、财划法案等进行了较为成功的合作,并在2001年底的“县市长”选举中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整合。相对于陈水扁提出的“全民内阁”、“跨党派国安联盟”等主观构想,泛蓝阵营的自然整合给民进党的执政造成有力的牵制和极大的困扰。2002年1月22日,国民党秘书长林丰正与亲民党秘书长钟荣吉正式签署国、亲两党“政策协调机制”运作办法,为国、亲两党的政党合作制度化奠定了基础。

二、泛蓝阵营结合的政治基础

政党是利益表达、利益聚合与选举动员的政治团体。政党合作,其核心是利益的一致性,而共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支持基础是政治合作的必要的主客观条件。岛内政党政治的现实为在野党特别是国、亲两党的合作创造了客观的政治环境,泛蓝阵营的选民有合作的呼声,国、亲两党的高层领导人也意识到政党合作的重要性,正如国民党主席连战所言:“国亲两党有‘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根源’,也有‘充分合作的机会’”^②，“在当前台湾的政治环境下,国民党和政治上的朋友’,包括亲民党、新党,应该要合作、团结,唯有团结,才有力量的展现,才能得到好的结果”^③。

1. 相互接近的政治意识形态

国民党、亲民党和新党系出同源,具有相互接近的政治意识形态。三党都尊崇孙中山先生为“国父”,他们都要求执政党尊重“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回归“宪政常轨”,回归“92共识”。在统独立场上,三党都认同“一个中国”,承认“92共识”。国民党表示仍然坚持以“国统纲领”为大陆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维持《国统纲领》的两岸关系架构,主张“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大陆和台湾都属于一个中国”,经过三阶段发展,最后协商统一。亲民党虽然主张“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两岸现在存在两个政治实体”,认为两岸关系是“准国际关系”,但是承认在统一前“国际上确实存在着‘一个中国’原则”。亲民党主张统一要经过三个阶段,至少需要50年的时间。其具体主张是:签订30年互不侵犯和平协定,以美国等为国际见证;再仿效欧盟模式20年,最后前途如何由台湾人民决定。

2. 互相重叠的社会支持基础

新党和亲民党均系先后从国民党中出走的政治力量结合而成的政党,三党同源,具有相互重叠的社会基础。在1992年新党从国民党中分裂出走之前,国民党的“立委”得票率为61.67%;1995年新党从国民党中分裂出走之后,国民党的“立委”得票率下降,但是国、新两党的总得票率仍达到59.01%;2000年“总统”选举,泛蓝阵营三组候选人的得票率总计为60.07%;2001年,亲民党从国民党中分裂出走之后,泛蓝阵营在“立委”选举中的总得票率有所下降,为54.48%。从总体上看,三党相互重叠的票源基础相对稳定,这在三党的得票率变化中得到充分表现。

3. 共同的政党权力斗争需要

面对民进党依赖国民党的分裂逐渐壮大的趋势,泛蓝阵营特别是国、亲两党的高层均意识到政党合作的必要性,不合作就不会有再次执政的可能,不合作则岛内的政治权力将长期沦为执政党的囊中之物,在野党不仅没有分享权力的机会,也将逐渐失去发展成长的政治经济资源。正是共同的权力利益促成了政党之间的政治结合。为了确立政党合作的基础,国民党宣布以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为被告的“兴票案”不申请再议,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投桃报李,表示只有连战才能让国民党稳定下来。国、亲两党并协调政治立场,拒不支持执政党提出的“联合政府”、“国安联盟”构想。

4. 共同的“反李”历史经验

泛蓝阵营三党的政党合作,与三党共同的“反李”历史经验是分不开的。新党是90年代初国民党内流派斗争的产物,李登辉在国民党内通过打压、排挤党内的外省籍非主流派巩固其政治权力,国民党内的中生代基于危机意识出走,以“反李”的旗帜凝聚了岛内的支持力量。亲民党也是以宋楚瑜为核心的政治势力受到李登辉打压的结果。1997年岛内第四次“修宪”完成“冻省”之后,宋楚瑜与李登辉公开决裂,宋楚瑜以独立参选人的资格竞选“总统”,在选后集合支持力量成立亲民党,在2001年底的“立委、县长”选举中取得第三大党的政治实力,而李、宋之间的心结终难化解。连战虽然是李登辉亲自挑选的国民党接班人,但是国民党在2000年3月“总统”竞选中失败之后,基层党员的“反李”声浪高涨,李登辉在党内的声讨之下被迫辞职。李登辉却迁怒于连战,认定连战“逼宫”,甚至公开指责连战“缺乏跳出少爷习性的自觉”,并对连宋合作对抗陈水扁执政表示不满,出面支持“台联”,攻击国民党“联共反台”。不仅李登辉与连战关系急转直下,而且李登辉与国民党的关系也形同陌路。国民党、亲民党、新党三党的“反李”情结虽然程度有差别,但是三党与李登辉恩怨的共同历史经验却构成了三党政治合作的重要基础。

三、泛蓝阵营的政治实力分析

在以选举为政权交替方式的政党政治下,党员是政党的最核心和最稳定的支持者,而政党在选举中的得票率是政党支持率的现实表现,但是同一政党在不同选举中的得票率会发生变化,这表明政党得票率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与政党支持率并不一致。台湾各政党的支持率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不同阶段的民意调查中得以体现,民调支持率虽然并非完全准确,但却是政党实力的间接表现。因此,从政党组织、选举得票率、民调支持率三个方面进行量化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各政党的政治实力。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各政党的政治实力之和并不等于泛蓝阵营的总体实力,由于政党合作的复杂性,泛蓝阵营特别是在选举合作中能否凝聚各政党的支持者,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制约。

1. 从政党组织分析

在野各政党中,以国民党的组织机构最为健全。国民党原有党员200多万,“总统”选后推动政党改造,进行党员重新登记,至2001年1月30日,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作业截止,登记的党员人数超过了93万人,仍属岛内各政党中正式党员人数最多的政党。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一级单位有34个,基层乡镇区党部有378个。健全的组织机构,雄厚的经济实力是国民党的优势,但近年来也产生了党务系统官僚化,政党高层脱离基层的弊病。

亲民党作为新兴政党,组织机构和政党体制处于草创阶段,但是政党成员较为团结,拥有

一个具有号召力的领导核心。亲民党成立后,现有经选举产生的公职人员 100 人,其中县市长 2 人、“立委” 45 人、县市议员 49 人、乡镇长 4 人,在岛内拥有相当政治资源和实力。

新党在 1994 年刚成立初期的发展高峰,拥有党员 7 万多人。在 2001 年底的选举中惨败,仅有 1 席县长和 1 席“立委”,选后新党将柔性政党改造为刚性政党,改组后的新党仅剩 1200 余人参加了党员重新登记。新党走向了泡沫化,其力量已经基本上为其它政党所吸收,不再拥有引人注目的动员力和号召力。

2. 从选举实力分析

90 年代以来,从国民党中分裂出新党和亲民党,国民党的力量被一分为三,而民进党的力量在缓步增长。分析各政党历年选举的得票率,有助于对比泛蓝与泛绿阵营的实力消长。

表 1 国、亲、新三党历年选举得票率分析 (%)

选 项	国民党	亲民党	新党	三党合计
1992 年“立委”	61.67			61.67
1993 年县市长	47.47		3.07	50.54
1995 年“立委”	46.06		12.95	59.01
1996 年“总统”	54		14.9	68.9
1997 年县市长	42.12		1.42	43.54
1998 年“立委”	46.43		7.06	53.49
2000 年“总统”	23.1	36.84	0.13	60.07
2001 年“立委”	31.28	20.34	2.86	54.48
2001 年县市长	44.93	2.35	0.17	47.45

从表 1 分析可知,国民党在分裂之前的 1992 年“立委”选举得票率超过了 60%,而在 2000 年的“总统”选举中,虽然泛蓝阵营分裂,但国、亲、新三党候选人的总得票率仍然超过了 60%。2001 年底的“立委”和县市长选举,泛蓝阵营受到李登辉组织的“台联”加入泛绿阵营的冲击,但是相对于 1997 年的县市长选举和 1998 年的“立委”选举,泛蓝阵营的总得票率仍然有所增长,这也说明,在野各政党的合作有利于三党整体实力的巩固和成长。

而执政党民进党在历年全台性的选举得票率从未突破 50%,2001 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得票率为 45.27%;“立委”选举得票率为 36.57%,即使加上“台联”的得票率 8.5%,也只有 45.07%。国民党在 2001 年底的“立委”选举中席位大幅下滑,成为第 2 大党,但在 2002 年 2 月 26 日的基层选举中仍维持了第 1 大党的政治实力。在全台湾 319 个乡镇市长中,国民党当选 225 席,占 75.3%,民进党只当选 28 席;在县市议员部分,国民党当选 424 人,占 47%,民进党当选 147 席,占 16.39%。2002 年 5 月 4 日,台湾省 15 个农田水利会的会长选举,国民党当选 14 席,民进党只当选 1 席。民进党虽然拥有执政资源,但支持率仍然受困于“台独党纲”和省籍因素,民进党前秘书长吴乃仁认为:“台湾选民的‘认同投票’倾向,在下次总统大选前看不出有改变的可能”^④。台湾选民的基本结构为在野党的选举合作提供了可能、创造了机会。

3. 从民调支持分析

从台湾各方面的民调资料分析(见表 2),民众对于各政党、各主要政治人物的支持率,在排序上基本没有变化,民进党—亲民党—国民党依序排列。但在具体的支持率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民进党的支持率在上升,2002 年 5 月 17 日《中国时报》发表的民调显示,陈水扁的支持率是 40.1%,已经超过了连战和宋楚瑜支持率的总和 22%。虽然民调与现实有误差,民调也并不等同于选举结果,但是民众支持率的变化趋势,特别是泛蓝阵营支持者大幅度的转向,是泛蓝阵营政党合作的重大隐忧。

表 2

台湾主要政党或领导人民调支持率(%)

民调时间及来源	民进党	国民党	亲民党	台联	新党	其它
2000年10月 国民党政策会	21.44	23.11	23.81		0.44	无党籍 2.9 建国党 0.18
2000年11月 联合报系民调中心	22	16	20		1	40
2001年2月 TVBS 民调中心	24	12	23			37
2001年5月16日 《中国时报》	13	7	12		1	67
2002年5月 民进党中央民调	30	13	18	5.1		
2002年5月17日 《中国时报》	陈水扁 40.1	连战 5.5	宋楚瑜 16.5			37.9

四、泛蓝阵营的政党合作模式

政党合作,主要表现在谋求资源分配的政策与选举合作中。合作的具体形式构成了政党合作的模式。

1. 政策法案合作

由于泛蓝各政党在“立法院”的席位数超过了泛绿阵营的席位数,泛蓝阵营在民进党执政以来在“立法院”进行了成功的政策法案合作,其中较为突出的包括“总统、副总统罢免案”、政府各部门的预算案、中央与地方财划法案、修改两岸关系条例中的“三通”条款等等法案。国、亲两党在“立法院”的政策法案合作,不仅给执政党造成有力的牵制,而且为在野党争取了有利的资源。

2. 政党沟通机制

政党沟通机制是政党合作的制度化形式,为政党合作确立了畅通的协调渠道。2002年1月22日,国、亲两党正式签署“中国国民党暨亲民党‘政策协调机制’运作办法”,规范了两党的政策协调机制,包括4个不同层级的沟通渠道,一是两党“立法院”党团负责人会议,负责协调两党在“立法院”的政策法案合作;二是两党中央的政策单位协调,国民党为中央政策会,亲民党为政策研究中心,就重大政策议题进行沟通合作;三是秘书长层级会议;四是两党主席会议。国、亲两党政党沟通机制的建立为两党合作排除障碍、协调立场奠定了较为牢固的基础。

3. 选举合作

选举合作是政党合作的最高形式和最复杂的方面。实际的选举合作包括共同支持一组候选人、票源分配、选举席位分配等诸多方面,国、亲、新三党在2001年底的县市长与“立委”选举中进行了选举合作的初步尝试,并在县市长选举中取得显著的成果。由于亲民党在北台湾的多数县市支持国民党候选人,使得泛蓝阵营的资源得以整合,国民党夺得北台湾六个县市的执政权——基隆市、桃园县、新竹县市、台中县市。台北县泛蓝阵营团结起来支持新党的王建煊,虽然最后没有当选,但得到了82万多票,与民进党的苏贞昌87万多票相差不远。

国、亲两党对于2002年底的台北、高雄两市市长选举也有强烈的合作意愿,但是相对于台北市长的选情单纯,高雄市长选举由于泛蓝阵营参选人众多,协调困难,也影响泛蓝阵营的团结。北、高两市的选举必定为2004年的“总统、副总统选举”确立泛蓝阵营合作与协调的模式,无论是候选人协调还是民调决定,无论是选情单纯还是协调困难,都将影响最后的选举结果。

4. 政治权力分配

政党合作的最终目的就是参与政治权力的分配,因此,政治权力分配是政党合作的最后形

式,对于政党合作的成败与团结有极大的影响。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提出国、亲两党共组“执政团队”的构想,然而由于两党对于“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的确定仍有较大分歧,在两党共同支持的一组候选人确定之前,确立政治权力分配机制的可能性不大。

五、泛蓝阵营的政党合作前景

泛蓝阵营的合作加剧了岛内政党格局两极化的发展趋势,使得认同问题成为政党政治的核心;泛蓝阵营的合作也牵制了民进党吸收中间选民的能力,有利于在野各党整体实力的增长。然而,相对于促成国、亲两党之间组成泛蓝阵营,进行政党合作的有利因素,其不利因素的影响是更加深层和潜在的。虽然两党拥有共同的对手和共同的目标,但是,两党之间争夺主导权、党内的异议、泛绿阵营对其分化、民进党优势的增长都制约和影响了政党合作的顺利发展。在生死存亡的选择时刻,如果任由这些矛盾激化,使得两党之间被掩盖的政治矛盾表面化,就可能使泛绿阵营再次“渔翁得利”,并且失去制约能力。

1. 国、亲两党之间争夺泛蓝阵营的主导权及两党内部对于政党合作的异议是泛蓝阵营合作的隐忧。

国民党与亲民党之间的政党合作,虽然有客观的政治环境,也有一定的主观意愿,但是两党都有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为了政党的生存和发展,两党之间存在着争夺政治经济资源的矛盾冲突,表现为对于泛蓝阵营主导权的争夺。国民党由于具有组织结构与经济实力的传统优势,从泛蓝阵营结合的一开始就居于主导地位,但是亲民党并不甘心当老二,亲民党副主席张昭雄就曾提出“泛宋军才是代表民意主流”的说法,引发国、新两党的警觉和批判。面临2004年的“总统”竞选,国、亲两党有意共推一组候选人,但是谁正谁副的问题,是一个具有高难度的政治利益分配的关键。能否合理分配政治经济资源,是国亲两党能否成功合作的重要因素。

同时,两党内部的个别成员出于个人的、地方的政治利益考虑,对于政党合作持有异议,潜藏着分化泛蓝阵营的可能性。在国民党内部,隐藏着尚未激化的路线斗争,本土路线与非本土路线仍在暗中角力。本土路线主张“亲李”、“尊李”,主张与民进党合作;非本土路线主张与李登辉划清界线,主张与亲民党合作。国民党内的路线斗争如果激化,不仅会危及泛蓝阵营的合作基础,而且会进一步削弱国民党的政治实力。亲民党在宋楚瑜的政治光环下,虽然较为团结,但也有一些不同的杂音。

2. 泛绿阵营的合纵连横策略分化泛蓝阵营的团结。

泛蓝阵营在政党合作的同时,泛绿阵营民进党与“台联”也在趋向联合,李登辉筹组“台联”的公开目的之一即是“协助陈水扁执政”。民进党、“台联”均对泛蓝阵营虎视眈眈,希图从泛蓝阵营的分化中扩大政治势力。李登辉及其领导的“台联”把宋楚瑜视作眼中钉,极力阻止宋楚瑜及其亲民党政治力量的发展,甚至不惜在“立法院”提出“只有台湾出生的人才能参选总统”的“台生条款”。李登辉并且亲自出面组织“群策会”,向泛蓝阵营中的本土力量招手,对泛蓝阵营政治实力的巩固和发展造成极大的威胁。

3. 民进党的优势压缩了泛蓝阵营的成长空间。

与上一次“总统”选举相比,2004年的选举,陈水扁作为现任的“总统”兼党主席,拥有更多的优势,他能主导庞大的党政军情的资源,同时取得李登辉的公开支持。而且,随着台湾经济逐渐好转,许多台湾民众心态上要求政局安定,不希望经历一次政党轮替之后,再经历第二次

政党轮替,陷入政局动荡之中。《中国时报》执行副总编辑杨宪村在分析各种可能性之后,认为“下届台湾总统大选,基本上仍是‘扁宋’对决的局面”,并指出:“未来无论情势如何演变,整体而言,陈水扁连任的机会是非常大的,‘扁宋之争’几乎处于七三开或六四开的对比优势状态,除非泛蓝军整合成功,宋楚瑜才有五五波或情势逆转的可能”^⑤。

面对陈水扁在诸多有利的条件下,泛蓝阵营的政党合作,第一种可能是团结的合作,成功地凝聚了泛蓝阵营的认同票源,以过半数的得票率夺回执政权;第二种可能是合作失败,泛蓝阵营分裂,大量的中间选民转向支持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以高票当选连任,成为强势“总统”;第三种可能是不成功的合作,泛蓝阵营虽然最终协调出一组候选人,但是由于党内的不团结和泛绿阵营的分化效应等因素的冲击,以较小的差距败北,泛蓝阵营选后对执政党仍有较强的制衡力量。

注:

① 迈克尔·罗斯金等著、林震等译:《政治科学》,华夏出版社 2001 年 1 月第 1 版,第 247 页。

② 《自由时报》2002 年 4 月 19 日。

③ 《中国时报》2002 年 4 月 19 日。

④ 《中国时报》2001 年 12 月 5 日。

⑤ 《中国时报》2002 年 5 月 21 日。

[责任编辑 林 劲]

(上接第 33 页)

注释:

① 如庄金德:《郑氏军粮问题的研讨——从郑氏的缺粮征粮到屯田台湾》,载《台湾文献》12 卷 1 期;徐国祥:《郑成功军粮问题的探索》,载方友义主编:《郑成功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 年。

②③ 杨英:《先王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 241 页、第 243 页。

④ 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城日志》,载厦门大学郑成功历史调查研究组编《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256 页。

⑤⑥⑦⑧ 杨英:《先王实录》,第 245~ 246 页、第 248 页、第 252 页、第 256~ 258 页。

⑨ 卢若腾:《岛噫诗》,台湾文献丛刊本,第 25 页。

⑩⑪ C. E. S.:《被忽视的福摩萨》,载《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 167~ 169 页、第 207 页。

⑫ 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城日志》,载《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 268~ 269 页。

⑬⑭⑮⑯ 杨英:《先王实录》,第 252 页、第 245 页、第 257 页、第 259 页。

⑰ 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城日志》,载《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 280~ 281 页。

⑱ 江日 :《台湾外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161 页。

⑲ 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城日志》,载《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 287 页。

⑳㉑ 杨英:《先王实录》,第 253 页、第 252~ 255 页。

㉒ 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城日志》,载《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 280 页、290 页。

㉓ 转引自陈汉光:《郑氏复台与其开垦》,载《台湾文献》12 卷 1 期。

㉔㉕ 诸家:《台湾诗钞》,台湾文献丛刊本,第 23 页。

㉖ 卢若腾:《岛噫诗》,台湾文献丛刊本,第 24 页。

㉗㉘㉙ 杨英:《先王实录》,第 253 页、第 248 页、第 244 页。

㉚ 江日 :《台湾外记》,第 168 页。

㉛ 阮 锡:《海上见闻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47 页。

[责任编辑 陈孔立]